

湖南新文学七十年

康咏秋 华济时 龙长顺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新文学七十年

康咏秋 华济时 龙长顺
陈仕持 罗仕安 王乾生
陈吾南 罗 田 化 夷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长沙

湖南新文学七十年

康咏秋 华济时 龙长顺等著

责任编辑：周小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湘潭师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1 字数：290,000 印数：1—3000

1992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7—5404—1048—5

I·840 定价：7.50

序 言

郑 培 民

湖南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乡，自古以来，三湘四水陶冶了无数风流人物。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直成为湖南人民的骄傲。近代以来，湖南风云迭起，时势造英雄，时势造人才，湖湘之地更是人才辈出，不少匡时济世之才应运而生，其中当然不乏文人学士。迨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新思潮很快传播湘江两岸。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革命青年的出现，以及《湘江评论》的创立、文化书社的成立，揭开了湖南新文化，其中包括新文学的光辉篇章。从此，湖南的文化和文学人才更是灿若群星，发出耀眼的光芒。现代史学家谭其骧所谓“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湖南人才当然包括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

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湖南这块沃土曾孕育了一大批作家、诗人、戏剧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他们带着楚地人民的可贵气质和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当时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喊出了人民群众当时的所想、所愿、所急、所忧、所悲，以至所苦和所乐，为中国革命和湖南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南青年一代作家茁壮成长，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的文学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个为全国同仁和广

大读者公认的作家群体。新时期十年，可以说除北京之外，湖南是长、中、短篇小说都曾获得全国优秀作品奖的唯一省份。获得这类全国性奖的作家有20人次，获奖作品33部（篇），其中短篇自1979年第一届颁奖起，连续6年有人获奖。80年代后期，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一段时间的湖南作家的整体实力和创作水平虽曾一度有所下降，然而90年代初期，文坛上的“湘军”又很快第二次崛起，一批原已成名的作家仍然充当了带路人的角色，且愈益炉火纯青，而近年来出现的青年作者，也正锋锐势猛，其作品更具有生活深度和艺术力度。

湖南新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它所经过的七十年的历程，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湖南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发表过大量评论，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尚未有人对湖南新文学七十年的历史作过整体性的考察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没有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出现，由康咏秋、华济时等人撰述的《湖南新文学七十年》一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撰述者们工作严肃认真，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分析钻研。该书在吸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发掘、梳理工作，对其内容和体例也作了相当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该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乡土教材。它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首先，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五四”以来湖南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情况及其规律和特色，较为恰切地评价了百余个作家及其作品，从而为进一步繁荣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借鉴历史的经验，是更好地为今天服务，更好地对陈规陋习进行批判，对消极丑恶进行揭露，对时

代精神进行讴歌，对未来前途进行更好的展望。

其次，该书也是一部较为完备、新颖的地方新文学史教材。乡土文学既是整个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现体现了具有省情和乡情的地方特点。人们热爱祖国和热爱乡土的感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该书的出版，必将加深湖南人民热爱故乡之情，必将激励人们建设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志向和热情。

当前，全省人民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紧紧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我省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跻身全国十强而发愤图强。我衷心预祝《湖南新文学七十年》在我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潮中，为我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起到应有的作用。

目 录

序 言	郑培民 (1)
绪 论	(1)
现 代 篇	
第一章 湖南现代文学的发展	(27)
第一节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湖南文学 (27)
第二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文学	(33)
第三节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文学	(41)
第二章 湖南现代小说创作 (上)	(47)
第一节 概述	(47)
第二节 不肖生的小说	(51)
第三节 彭家煌、黎锦明的小说	(55)
第四节 刘大杰、罗昉岚、孙俚工的小说	(61)
第五节 沈从文的小说	(69)
第三章 湖南现代小说创作 (下)	(76)
第六节 张天翼、蒋牧良的小说	(76)
第七节 叶紫、彭柏山的小说	(82)
第八节 丁玲的小说	(87)
第九节 周立波的小说	(93)
第十节 康濯的小说	(98)

第四章 湖南现代诗歌创作	(104)
第一节 概述.....	(104)
第二节 朱湘、刘梦苇的诗歌.....	(110)
第三节 石民、吕亮耕的诗歌.....	(116)
第四节 萧三、陈辉的诗歌.....	(121)
第五节 革命烈士的诗歌.....	(127)
第五章 湖南现代戏剧创作	(135)
第一节 概述.....	(135)
第二节 欧阳予倩的戏剧.....	(141)
第三节 田汉的戏剧.....	(147)
第四节 白薇、袁昌英、向培良的戏剧.....	(153)
第六章 湖南现代散文创作	(160)
第一节 概述.....	(160)
第二节 陈衡哲、易君左的散文.....	(165)
第三节 谢冰莹、黎烈文的散文.....	(170)
第四节 廖沫沙、陈子展的杂文.....	(176)
第七章 湖南现代文学评论	(183)
第一节 概述.....	(183)
第二节 成仿吾、贺玉波的文学评论.....	(186)
第三节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93)
第四节 周扬的文学理论.....	(199)
当代篇	
第八章 湖南当代文学的发展	(205)
第一节 建国十七年的湖南文学.....	(205)
第二节 十年文革时期的湖南文学.....	(209)

第三节	新时期十年的湖南文学	(212)
第九章	湖南当代小说创作(上)	(217)
第一节	概述	(217)
第二节	杨沫、李六如的小说	(222)
第三节	周健明、谢璞、王以平的小说	(228)
第四节	孙健忠、刘勇、萧育轩的小说	(235)
第十章	湖南当代小说创作(下)	(242)
第五节	古华、谭谈、莫应丰的小说	(242)
第六节	叶蔚林、金振林、水运宪 (208) 的小说	(249)
第七节	任光椿、黄鹤逸、宋梧刚、琼瑶的小说	(256)
第八节	张扬、潘吉光、张步真、鲁之洛 的小说	(265)
第九节	韩少功、何立伟、蔡测海、残雪 的小说	(272)
第十节	萧建国、彭见明、刘舰平、聂鑫森 的小说	(282)
第十一章	湖南当代诗歌创作	(291)
第一节	概述	(291)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	(297)
第三节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	(302)
第四节	朱子奇、彭燕郊、洛夫、向明的诗歌	(308)
第五节	未央、汪承栋、石太瑞、弘征的诗歌	(316)
第六节	于沙、柯原、黄永玉、瞿琮的诗歌	(323)
第十二章	湖南当代散文创作	(331)
第一节	概述	(331)
第二节	柯蓝、钱歌川的散文	(335)

第三节	陶承、朱仲丽、朱奇、王正湘的散文·····	(341)
第四节	崔合美、赵海洲、颜元叔、龙应台 的散文·····	(347)
第十三章	湖南当代戏剧创作·····	(354)
第一节	概述·····	(354)
第二节	范正明、陈荒、李果仁、陈亚先 的戏剧·····	(359)
第三节	陈健秋、冯柏铭、甘征文、吴傲君 的戏剧·····	(365)
第十四章	湖南当代文学评论·····	(372)
第一节	概述·····	(372)
第二节	吴奔星、李桑牧、朱正、陈漱渝 的文学评论·····	(376)
第三节	陆耀东、李元洛、陈早春、凌宇 的文学评论·····	(382)
后 记 ·····	康咏秋	(389)

绪 论

“湖南新文学七十年”，即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而迄于90年代初的湘籍作家、作品所建构的湖南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70年，它是“五四”以来湖南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至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六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向南拓展到中日甲午战争，为古代湘楚文化阶段和近代湖湘经世文化阶段。发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湖南古代文学和湖南近代文学，其代表人物有屈原、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李东阳和王夫之、曾国藩、何绍基、吴敏树、郭嵩焘、邓辅纶等；第二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文化阶段和资产阶级革命文化阶段，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三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阶段，文学上则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叶紫、康濯等。

古代的湖南文学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十分落后，近、现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湖南文学始呈繁荣局面。谭其骥先生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一文中说得好：“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近、现代以来湖南文化及其文学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人才的问题很复杂，因缘当然也很多，但归纳

起来总不出地理、生物、文化三种。”^①他以为这三种因素缺一不可，地理能起移徙的作用；生物的因素、尤其是才性遗传也有影响；还有文化传统熏陶、浸染的力量，此种因素影响更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一切外因都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文学创作三要素，生活、思想和技巧，在这里，作家的主观努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湖南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近几年来，在湖南境内发现了1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的分布遍及全省，尤以洞庭湖地区和澧水、沅水、湘江、资江等下游最为集中。从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文物来看，居住在这里的湖南先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狩猎、采摘，生息繁衍，过着茹毛饮血的史前生活，创造了湖南最初的史前文化。从新石器到西周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湖南境内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和杨越，至荆楚人入湘后，荆楚人与三苗、杨越相融合，才产生了既受荆楚人携带而来的中原商文化的熏染、影响，又具有浓厚地方性的楚文化和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

在湖南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遗存下许多名胜古迹。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位教民以“削耜翻土、磨唇而耨、饲禽养畜、草木而医”的炎帝的最后归宿，就在酃县；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驾崩宁远九嶷山，以致“天下万山朝九嶷”流传至今。而他的两个妃子殉情的地方就在今天

^① 《近代苏州的人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5年第1卷第1期。

岳阳的君山；大禹治水奔走于大江南北，最后在南岳受“金简玉书”的指点，才治服水患，南岳的峻峰和长沙的岳麓山至今还保留着“禹碑”这一遗迹；汉初的贾谊，鉴于秦王朝复亡的教训，提出了改革政治、实行法治的主张，被贬谪长沙，任长沙王太傅。他悲叹自己的遭遇，写下《吊屈原赋》、《鸟赋》等篇什，留下“万古唯留楚客悲”之叹；唐代柳宗元也因被贬谪永州10年，由于对社会和人民的深入了解，写成了一系列山泽纪行的绝妙文章《永州八记》和揭露吏残民苦的《捕蛇者说》等散文名篇。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传说、遗迹上，更重要的是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中。中华民族绵延5000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向心力、凝聚力，这就是梦魂萦绕的国家、民族情结，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土壤之中。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即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和同仇敌忾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其核心就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这些精神支柱给人们以拼搏的动力，给民族团结以号召力。屈原的“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表现。屈原故里虽为湖北秭归，但长期流放湖南境内，行吟于洞庭湖畔和沅、湘之滨，经过了几十年激烈、惨痛的政治斗争和对生民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时的思想人格已达到最成熟的境界。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以湘方言、湘民歌入诗，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开创了一个与《诗经》风格迥然不同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象征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屈原精神所建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便酿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理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才的

成长。

文学既是主、客观的反映，也应是传统文学基础上的更新和发展。屈原的辞章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且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两种审美样式。一是对地域山川景物、习俗民情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着意描绘；二是注重内容的厚实性、人民性，作品中充满了对时代、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许多著名诗人都在湖南生活过和活动过。杜甫客死湖南，孟浩然、王昌龄、李白和稍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结、元稹、李商隐等也都到过湖南，并在这里留下了很多诗文。如杜甫的《登岳阳楼》、《麓山道林二寺行》、《江南逢李龟年》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刘禹锡的竹枝词更是脍炙人口，可以说，竹枝词正是刘禹锡等在搜集、整理湖南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润色而走进文人文学的殿堂，走向全国的。在中原文化及其作家、作品的影响下，湖南文学也开始起步、发展。如书法家、诗人欧阳询（577—641，长沙人）和欧阳通（？—691）父子，书法家、诗僧怀素（725—785，长沙人），还有散文家刘蜕（长沙人，850年进士）、诗人李群玉（808—862，澧州人）、胡曾（约生活在晚唐839年前后，邵阳人）、任鹤（湘阴人）、曹松（衡阳人）、齐己（唐末五代，岳阳人）等，其中以李群玉、胡曾最有成就。

袁中道评李群玉诗是“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渚，荡思摇情”。其诗多山水、酬唱之作，《全唐诗》存诗三卷。诗人以清新、妍丽之笔描绘了湖南的山川名胜：有“后山鹤唳，前池荷香”、“月波如水，气爽星朗”的湘西寺（《湘西寺霁夜》），有“湖畔春山烟点点，云中远树黑离离”的澧州

洲渚（《长沙春望寄潯阳故人》），有“满院泉声山殿凉，卷帘微雨野松香”的石门峡山寺（《峡山寺上方》），以及二妃庙、岳阳楼等。他还以沉郁、悲凉的笔触写下了许多怀悼屈、贾的篇章，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和怀念。他的诗深受《九歌》的影响，并以新颖完整的构思、浑然一体的境界开创了我国山水诗的新局面，标志着我国山水诗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胡曾以写“咏史诗”著称，共147首，皆七绝。这些诗篇咏吟对象较广，从帝王将相到兵民妇女，从远古传说到隋末史实，每首都以地名为题，评说史事，意在托古讽今：一是议论帝王的篇什最多，偏指帝王的无能与过错。如《细腰宫》指责楚灵王荒淫昏庸，极喜“细腰宫”，最后只落得“国破城荒霸业空”的下场；二是赞扬历代贤才忠良的诗篇也不少，如《五丈原》以“秋风原下久徘徊”，“长星”为之“落九垓”的悲凉情感，表现了对诸葛亮的纪念和赞美；三是钦扬气节，感叹情义，如《居延》、《望夫山》等。他的诗歌形象生动，语言清新平易，议事抒情，引人入胜。因其诗通俗明快，雅俗共赏，后世仿作者甚多，也常为历史小说引用，还曾作过启蒙教材。

宋朝是我国文学史上词的高峰，著名作家范仲淹、黄庭坚、秦观、辛弃疾、朱熹和姜夔等，都曾先后蹉跎过湖南，留下了许多名篇，如范仲淹的散文《岳阳楼记》便是千古不朽之作。这一时期的湖南作家有周敦颐（1017—1073，道县人）、王以宁（北宋末，湘潭人）、计有功（南宋，安仁人）、乐雷发（生于宋理宗年代，宁远人）、陶弼等，其中以周敦颐、王以宁影响较大。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的散文家，也是宋朝理学的开山祖。在文学上，他主张“文以载道”，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其

散文代表作品《爱莲说》，寄寓高远，形象生动，清新秀丽，琅琅上口，久为世人传诵。他有《太极图说》、《濂溪集》留世。宋名词人王以宁有《王周士词》一卷，凡32阙。他一生在宦海军旅中沉浮，过着动荡艰险的生活，写下了许多回忆故人旧地、描摹家乡风物的词章。如《宿龟山晚登秋汉亭》，就通过“洞庭湖上银涛观”的描写，道出了“忆我烟蓑伴。此身天地一浮萍。去国十年，华发欲星星”的愤懑、孤寂心境。《裴公亭怀古》则抒发了贬谪长沙后郁闷、凄凉的心情。李纲称赞王以宁“单骑入贼巢，羁政其酋”、“勇而有谋”^①。文如其人，所作军旅词章，“英豪狂宕”、“句法精健，无浮艳虚薄之习”^②。

元朝以散曲最有特色。元散曲名家马致远就曾写过《潇湘八景》，卢挚也写过《长沙怀古》等。湘籍散曲家以冯子振（攸县人）较为有名，其作多写个人闲适生活，今存小令40余首，有《海粟诗集》，存《元诗选》中。另有散文家欧阳玄（1273—1357，浏阳人，欧阳修后裔），其散文较多，著有《圭斋集》。其碑铭墓志写得平实，力去浮华，而序跋、评论，则言简意明，多有变化。

历史发展到明、清两代，中国文学主潮逐渐由诗文转向小说，但在湖南由于工商经济不太发达，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仍使湖南文学中以传统的诗文占居主导地位。此期的诗文、戏曲家，以刘三吾（明初，茶陵人）、李东阳（1447—1516，茶陵人）、何孟春（1474—1536，郴州人）、杨嗣昌（1588—1641，常德人）和明清之交的黄周星的成绩最著。

①《乞保全王以宁札子》。

②《湘潭县志》卷八。

李东阳以台阁重臣柄持文坛，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茶陵诗派。这一诗派上承“台阁体”余绪，下开“明七子”先声。其诗典雅工丽，“以深厚雄浑之体”洗涤“淅缓冗沓之习”。他不仅以诗作“为明代一大宗”，且有明确、系统的文学主张。其论诗宗唐、宗杜，重视内容，强调“真情实意”，强调乐教、教化。在形式上注意体格声调，反对摹拟。虽有一定的文学发展观，但仍未脱离“台阁”气息。有《怀麓堂集》留世。黄周星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清兵入关，以明遗臣居而自甘流亡、贫困，后沉迷于诗文戏曲中以求寄托。在戏曲理论上，他强调教化功能和审美情趣的结合，反对堆砌汇书，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2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不仅吏治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所谓“士林风气”也极坏，多数知识分子醉心于科举制艺，热衷于功名、干禄，一些人沉湎汉学考据，自鸣清高，实际上不少人有名无实。近代世界的经济基础逐渐由农业为本转到工商立国，传统的静态农业文化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弱点日益显露出来。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少数人被西方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他们要求改革弊政，反对宋学、汉学的厚古薄今，空疏无用，舍本逐末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倡导经世致用中，湖南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上溯可追寻到王夫之，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后，便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湖南经世派群体。可以说，“经世”学说在湖南的兴起，正是湖湘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湖湘文化最为繁荣的阶段，涌现了魏源（1794—1857，邵阳人）、曾国藩（1811—1872，湘乡人）、何绍基（1799—1873，道县人）、吴敏树（1805—1873，岳阳人）、邓辅纶（1828—1893，武冈人）等一批散文家和诗